

苗族服饰——民族文化交融的结晶

Clothes of Miao Nationality—The Crystallization of the Blending of National Cultures

文 / 陈丽霞

服饰作为民族文化的物化形式,自始至终是与现实社会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紧密相连的,并受到宗教哲学、民族心理、自然环境、审美理想所左右,也就是说服饰与时代息息相关,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。

苗族服饰文化的交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:一方面,苗族内部各支系之间服饰文化交融密切。频繁地迁徙致使原本相对集中的苗族日趋分散,分散的苗族各支系生产力发展水平不一,自然环境也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异,由于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各方面的需要,各支系之间时而联姻,时而分聚,服装佩饰也常常互相学习与借鉴,导致苗族服饰出现纷繁多姿的可喜局面。另一方面,苗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文化互动交融,也致使苗族服装款式表现出的多样性特征。在苗族的历史发展进程中,迁徙时间长,分布面极广,因而族际居住环境也十分复杂。苗族与汉、瑶、侗、水、白、壮、彝、土家、仡佬、纳西、景颇等十多个民族毗邻居住或杂居,并与这些民族发生过或多或少的文化经济交流。族际间的文化交流必然包含了服饰文化的交融,各民族优秀的文化互相吸收与借鉴,并彼此产生深远的影响。

以苗族头饰为例,不难看出,很多饰品本起源于其他民族,历经岁月流逝,这些饰品已在原生民族绝迹,却出现在苗族的服饰之中。

网巾是明朝成年男子的束发之物。通常以黑色丝绳、马尾或棕丝编制而成。明、清之际,湘西苗族亦有围网巾的习俗,有史书及图画记载为证。如明成化年间沈瓚《五溪蛮图志》载:“男子绾锥髻于脑后,女子绾锥髻于头顶。”清康熙年间阿琳《红苗归流图》清晰地描绘了湘西永绥、乾城“红苗”男女用网巾束发的图画,并附文字:“绾发作螺髻,织篾为笄,以发纬之如蟹,匡施于髻。”乾隆初年段汝霖《楚南苗志》载:“男子蓄发去须,以篾织髻,蒙以假发,戴髻于首,横插簪五株。簪长五寸,用马尾织网巾束发。”

插在苗族银帽上的银花,史书记载称为“步摇”,最早作为男子的冠饰,汉代时流行于北方少数民族。它是以金银作细枝,

上附金片,缀于冠项,行辄摇曳,武士佩饰,以示英武。《汉书·江充传》载:“充衣纱縠禅衣,曲裾后垂交输,冠禅髻步摇冠,飞翾之纒。”

1965年辽宁省北票西官营子北燕族男性墓中,曾出土一件步摇冠饰:以金片作成十字形梁架,架上缀一仰钵形托座,座上伸出六根金枝,每枝绕以三环,环上各穿一枚金叶。这步摇冠便是现在苗族冠饰银花的雏形。

苗族佩戴在颈上的有一种叫“瓔珞”的项圈,也是借鉴吸收其他民族的饰物而发展演变而来的。瓔珞本为佛教饰品,后由于佛教的传播,首先为少数民族所接受使用。南北朝后传入中原,遂为汉族妇女采用,多用于宫娥歌妓,后转化演变为古代妇女颈饰用品。唐朱揆《钗小志》载:“上皇令宫妓佩七宝瓔珞,舞霓裳羽衣曲。曲终,珠翠可扫。”苗族胸颈上的其中一种项圈,就是在瓔珞饰品基础上的演绎与发展。

湘西苗族佩戴在胸前的牙签吊,也是汉代佩饰的遗存。苗族牙签吊工艺精巧,玲珑剔透,其下端坠吊的“五兵佩”,起源于汉代,流行于魏晋、南北朝。五兵佩是汉代妇女仿兵器之形制成的佩饰,以金银为之,所作兵器有五种,以合古制“五兵”之数。五兵指矛、戟、钺、盾、弓矢之类。民间妇女将兵器制成饰物,意避邪压胜。《宋书·五行志一》载:“晋惠帝元康中,妇人之饰有五兵佩。又以金、银、玳瑁之属为斧、钺、戈、戟,以当斧口。”苗族妇女在此基础上进行发展创造,加入牙签、挖耳勺、大铲、镊子等坠饰,佩戴至今。

苗族佩戴在肩际上的云肩,也借鉴汉族地区妇女的装饰表现手法。五代以前,云肩主要用于舞女、乐伎表演,之后普及民间,男女均可佩戴。元代,贵族男女通行,并定为官服制度。《元史·舆服志一》载:“云肩,制如四垂云,青缘,黄罗五色,嵌金为之。”延至明清,仅限于妇女的礼服装饰用。清末,低髻流行,云肩使用更为普及。苗族云肩经过几个朝代的发展与演变,形成了独特而鲜明的装饰艺术特色。

湘西一带的苗族服装款式,由于受清朝统治者的“同化”政策影响,接受了衣衽右掩的“大襟栏干型”满族服装款式,同时,又融合了本民族特有的服饰文化元素,成为苗族服饰文化大家庭中的一枝独秀。用于苗族刺绣的钹花艺术,来源于北方民族的剪纸,基于苗族民众刺绣花纹需要摹本要求,汉族人来到苗区销售纸花,传授钹花技艺,钹花剪纸艺术融合了苗族纹样造型理念,形成独具特色的民族艺术。

费孝通在论述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时说:“它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存在的民族单位,经过接触、混杂、联结和融合,同时也有分裂和消灭,形成一个你来我去、我去你来,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一体。”服饰作为一种文化现象,在民族与民族交往过程中,成为多元文化交流的载体。在这一载体中,融合有来自南方少数民族的“耳档”,起源于北方少数民族的“跳脱”,流行于黄土高原汉族的剪纸,以及从古代饰物中沿袭而来的“步摇”、“五兵佩”和中国传统的龙、凤、鳞纹样等。

苗族在其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,服饰经历了一个为服从民族审美定势需要,而演绎、组合、变异的民族化过程。其一,服饰作为生活必需品,在族际间的文化交流过程中,吸收、借鉴了其他民族服饰元素的优秀品质。其二,苗族服饰的民族化过程同时又是一个创新的过程。由于群体审美观念的规范,在艺术创新的过程中,苗族服饰逐渐形成了自己鲜明的民族个性。

服饰的发展与转型,涉及人类文化的交流、融合、碰撞、冲突、继承、创新等有关文化发展方向的问题。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与影响,是民族文化交往过程中必然要产生的一种文化渗透现象,它使得苗族服饰出现丰富多彩的多元化局面。苗族服饰的发展与变革,是民族文化互相吸收与借鉴、结合与扬弃的过程,也是各民族文化与交融集体智慧的结晶。

陈丽霞 吉首大学美术学院讲师